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希伯来圣经阐释*

[澳大利亚] 罗兰·博尔

内容提要:西方马克思主义何以影响希伯来圣经的研究? 我们通过诸如诺曼·戈特瓦尔德和大卫·乔布林等学者的创作可窥一斑。两位学者通过其采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实现这种影响,该辩证法演绎出矛盾、阶级冲突、意识形态和生产方式。戈特瓦尔德的创作特征是一系列富有成果的矛盾因素:平淡如水的叙事风格和充满激情的内容、纳贡的生产方式和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以及科学编史和乌托邦的创作。乔布林从早期的结构主义阶段转向以解放主义诠释学为核心的马克思主义后现代结构主义。本文的基本悖论即通过第一世界的批评家理论来表达超出此语境的政治问题。这些问题显示出“晚期”资本主义范围内的圣经批评所面临的对抗因素和阶级冲突。

关键词:西方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阐释;马克思主义圣经批评

* 本文原载于 David J. A. Clines and Philip R. Davies ed.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the Old Testament* (Sheffield: Sheffield Academic Press Limited, 1998)。

Western Marxism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Roland Boer [AUS]

Trans. by Xue Chunmei

Abstract: How does western Marxism influence the study of the Hebrew Bible? Though the work of scholars such as Norman Gottwald and David Jobling. The influence of both scholars is traced by using a Marxist dialectical method that seeks out contradictions, class conflict, ideology, and mode of production. Gottwald's work is characterized by a series of fruitful contradictions: dispassionate style and passionate content, tributary and communitarian modes of production, capitalism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and historiography and utopian writing. Jobling has moved from an earlier structuralist phase to a Marxist poststructuralism with a specific focus on liberationist hermeneutics. The basic contradiction is the use of First World critics to articulate a politics that looks outside that context. These problems are symptomatic of the tensions and class conflicts that face biblical critics working within late capitalism.

Key words: Western Marxism; interpretation of the Hebrew Bible; Marxist biblical criticism

序 言

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的圣经批评,尤其是希伯来圣经的马克思主义批评,始终未有众多的理论实践者;然而,由于诺曼·戈特瓦尔德(Norman Gottwald)、大卫·乔布林(David Jobling)、大卫·潘钦斯基(David Penchansky)、约瑟·米兰德(Jose Miranda)、乔治·皮克思黎(Jorge Pixley)以及艾廷麦勒·茂斯拉(Itumeleng Mosala)等学者的努力,马克思主义已然成为圣经批评的一种通用理论。我已在另一著作^①中对这些学者的作品作了相关思考,不过,在此我只就北美的两位学者诺曼·戈特瓦尔德和大卫·乔布林的作品予以探讨。其原因在于,这两位学者给我提出了一个具有自传性质的问题:在“第一世界”(暂且引用这个表达并不太明确的措辞)做出政治贡献的男性白人,为履行解放理论和实践,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努力,其状况是不可思议的。

当然,矛盾论能够引出我目前使用的方法。矛盾论的根源可追溯至黑格尔的马克思主义传统;在那个传统中,矛盾论仅为辩证阐释法这个大分类下的一小项。然而,我在此完全遵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矛盾论为真正意义上之辩证批评的一个标志,这种批评会一直贯彻分析的方法直至排除矛盾。矛盾一经解决,便会显示其社会经济的本质。在我的研究中,阐释并非一个独立行为:毫无例外的,它是发生于遍布冲突的知识、社会、政治及经济大环境下的一个充满争议、遭人质疑的行为。正是这种囊括各种纬度之方法的辩证状况吸引了我。戈特瓦尔德和乔布林采用了与我近似的阐释程序,因此我将会从一个

① Roland Boer, *Jameson and Jeroboam* (Semeia Studies;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6), 110-121.

我们共用的方法和政治角度出发,来研究其著作。尽管这种党派性会带来不利之处,但我认为持批判性眼光且能接受的读者,他们所带来的益处要远大于此,尤其是在圣经研究中,因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引起的日渐激烈且活跃的争辩,更是让人受益。

辩证批评?

当代文化批评作为一个合情合理的文学批评平台,为左派(the Left)^①所主导。过去几十年来此类批评的呼声渐长,导致人们对它的方法论和理论名称(自称)争辩不休,反映了同期所谓“批判理论”的影响。结果,一些人宁愿摒弃“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称呼(自称)。麦克尔·瑞恩(Michael Ryan),作为一位文化批评学者尤其是电影批评家,认为对于代替陈旧的马克思批评的新理论而言,“政治批评”是一个更合适的指称(不过,他在关于“政治批评”的文章里,却交替使用这些术语)。②对于瑞恩而言,较之其他类型的文学及文化批评,“政治批评”涵盖更广,而且也更专注于目标。它涵盖更广,其原因在于某种程度上,它汲取了各种批评和阐释理论的财富,将各种类型纳入旗下,尤其是女性主义、现象学、符号学、结构心理学、解构主义及后结构主义等,以及电影研

① 除了 *Minnesota Review*, *Social Text*,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New Orleans Review*, *New German Critique*, *Telos*, *Left Curve*, *Red Bass*, *Sub-stance*, *October*, *Screen*, *Jump Cut*, *Polygraph* 等刊物专注于文学、电影及文化批评领域的杂志之外,在一些诸如 *Postmodern Culture* (<http://jefferson.village.virginia.edu>) 等的电子期刊中,在 *Badsubjects* (badsubjects-requests@uclink.berkeley.edu) 等刊物中,以及在英国出版商 Verso(一个新左派图书出版公司)出版的大量有关文学批评的卷集中,也可看到这种主导倾向。

② 瑞恩(Michael Ryan)漫不经心地搬弄“文化批评”一词,目的只是为了摒弃这个术语。参见 Michael Ryan, “Political Criticism”, in *Contemporary Literary Theory*, eds. G. Douglas Atkins and Laura Morrow (Amherst, MA: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9), 201。

究、文化批评等。在常规程序中,它会对探讨中的方法提出一些社会及历史的问题:换句话说,其乃集大成者,目的是在最广的范围内求索文本最大可能的社会语境。对于瑞恩,政治批评之所以更专注于目标,原因在于这种理论的目的明确指向对社会、文化世界的理解,最终形成这个世界的变革。^①

与瑞恩及那些认为解构主义等批评方法即足以构成超越马克思主义充分理由的人们相反,另外一些人比如弗兰西斯·马尔赫恩(Francis Mulhern)认为把这些混合式的新理论描述为“政治学的”、“社会学的”以及“历史学的”是一种简单化和自卫型的方式;^②应当保留“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描述标签,否则即意味着向诽谤和攻击这些理论的谣言投降。马尔赫恩声称马克思主义能够在不进行本质改变的基础上,对那些对立的新思潮和实践予以吸收或否决;然而,与此同时,他却深为一个问题所困扰:马克思主义批评的核心准则应当是坚定的固守还是批判性的实践?不过最终,批判性实践占了上风。

对此,我赞同马尔赫恩,不过,既能包含马克思主义又能囊括最近的多元化批评的方式是采用“辩证批评”一词。在此,我遵从尼尔·拉尔森(Neil Larsen)的观点;对他而言,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批评事实上为同义词。若有不同,则不同之处在于辩证批评明确强调的是黑格尔背景下和影响下的马克思主义思想。^③这与瑞恩

① Ibid.

② Francis Mulhern, “Introduction”, in *Contemporary Marxist Literary Criticism*, ed. Francis Mulhern. (Longman Critical Readers; London: Longman, 1992), 14.

③ 乍看之下,这可能排除了阿尔都塞理论者(Althusserians)的观点,他们以牺牲早期唯心主义的、黑格尔影响下的尚未成熟的马克思主义,来集中研究后期的马克思主义以及《资本论》(*Capital*)等重要文献。然而,即使他们也会赞同马克思主义批评理论的辩证本质(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先是颠覆、继而消除从黑格尔那里继承的思想)。

的观点具有同样的优势,即没有必要对马克思主义的“成因”刨根问底;不过与此同时,却消除了瑞恩的缺点,因为瑞恩完全摒弃马克思主义的表征。因此,在面临未自觉成为马克思主义批评但却在感觉上、味觉上以及表征上都显示为马克思主义批评的理论时,若有必要,“辩证”的指称允许从固守马克思主义的层面转向实践批判的层面。

诺曼·戈特瓦尔德

此研究献给以色列初民
并纪念他们

想想他们吧
唱歌、跳舞、热爱自己的人民
也热爱那些把爱置于权势之前的人们
这些人们崇尚有爱的权势
这样,得以摧毁无爱之权势

——选自致越南人民的一首无名颂歌^①

我对戈特瓦尔德著作中矛盾的探索始于其形式,特别是他那些表达审慎且整齐有序的语句。尽管在《耶和華部落》(*Tribes of Yahweh*)及其他更具科学研究性的著作里,^②戈特瓦尔德的语句满

① Norman K. Gottwald, *The Tribes of Yahweh: A Sociology of the Religion of Liberated Israel 1250-1050 BCE* (Maryknoll, NY: Orbis Books, 1979), i.

② 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的“The Participation of Free Agrarians in the Introduction of Monarchy to Ancient Israel: An Application of H.A. Landsberger’s Framework for the Analysis of Peasant Movements,” *Semeia* 37 (1987), 77-106; 以及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Semeia Studies;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3), 139-164.

载着令人生畏的社会科学术语,但是这些语句的句法却从未达到如术语那般复杂的地步,相反却保持着畅通的规律性和简单易懂性。那些语句包含多种涵义,其中之一是让那些无论是美国国内或国外在经济关系中处于被剥削地位的人们能够读懂,比如工人、农民、非洲裔美国人及拉丁美洲人等。它们较自觉地继承了启蒙运动富有逻辑而语气平淡的形势分析,这需要在政治激情和紧张中保持清醒冷静的学者头脑。这本身就极富学术特征,依靠古老但仍在广泛使用的科学研究模式;简而言之,其实质就是可被称为理智学术的“意识形态素”(一个清晰却受限的意识形态单位)。

历史批判话语追求严谨的分析和确凿性,这种理想的类型当然属于意识形态素的一部分。戈特瓦尔德关于主流历史批判论的早期著作在这方面意义重大,因为他的早期著作承上启下地以极具先锋性的意味将社会科学方法与圣经文本联系起来,而我们知道历史批判论和社会科学有很多共同之处。对于戈特瓦尔德而言,当他对详细的系列事件予以历史重构时,尤为如此;在那时,他依托社会科学之伞,仰赖历史批判的工具。然而,戈特瓦尔德不仅仅是一位历史批判家,因为即使在进行历史性重构的过程中,他也倾向于处理社会结构及其形成的复杂性,而非个人动机及特殊政治事件的那些狭窄领域。然而,对宽广领域的关注——或者说,对集大成的渴望——使他超越社会的结构上升至“生产方式”;对此,颇具矛盾的是,较之其他形式的编史,圣经材料和考古资料对他帮助更大。戈特瓦尔德超越历史批判论的另一迹象是他始于1975年并予以坚持的一个研究。在那项研究中,他采用普洛普(Propp)的民间故事理论探索《列王纪上、下》中的先知神迹故事:^①一方面他要赶上文学理论发展的步伐,^②另一方面他研

①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19-130.

② *Ibid.*, 207-224.

究将历史批判方法、社会科学研究方法以及文学研究方法链接起来的可能性。^①

对于戈特瓦尔德的叙事风格而言,以上所述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扩展。谈到叙事风格的问题,我要说戈特瓦尔德审慎表达的语句可被描述为“过去式叙述”。这些中等长度的谓语句试图冷静地叙述出以色列社会历史、宗教历史及经济历史的本质,或者我们当代社会或经济事件的状态。它们经过深思熟虑展现出对当下话题的叙述,我们很容易就可看出这些语句代表着“真实”。这也许说明了戈特瓦尔德想要去除神秘的部分原因,这同早先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批判论一样,不过他采用的是一种更为抒情的语言类型。因此,这些诗意的妙想并非意在寻求申命记——以赛亚式语言的乌托邦意义,而是成为一种过度热情的语言,意在劝诱遭驱逐的巴比伦统治者返回犹大。^②这种消除神秘的做法,可能被理解为明显对统治阶级的话语做出的辩护,而忽视被剥削阶级或那些刚在犹太高地获得自由者的话语。然而,尽管对《耶利米哀歌》^③的研究等出现更正面的评价,戈特瓦尔德在此却倾向于缓和或避开那些过分好斗和颇具沙文主义色彩的语言,比如《申命记》33或《士师记》5。^④

因此,戈特瓦尔德著作中的基本矛盾是形式与内容的矛盾。

①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85).

② Norman K. Gottwald, “Social Class and Ideology in Isaiah 40-55: An Eagletonian Reading”, in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Biblical Texts*, eds. David Jobling and Tina Pippin (*Semeia*, 59;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2), 43-57.

③ 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的 *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London: SCM Press, rev. edn, 1962); 以及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65-173.

④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357-358.

他采用启蒙运动时期学术的保守形式：那种形式以冷静而富有逻辑的学术话语体现出来。相反的，其著作的内容充满着从其叙事风格中捕获的激情、奉献和热情。这种从句法中抽取而出的激情，却被戈特瓦尔德以各种方式处处阻拦。任何人只需稍微浏览他的选集，^①便会注意到他绝非没有激情或者热切的理想。我们可以这样说：戈特瓦尔德的著作在形式上看不到，但在内容上却充满政治激情，即献身于社会变革、社会革命及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它自身是充满悖论的）、渴望民主社会主义而不是资本主义、为了批判资本主义而重振和重建希伯来预言（像马克思一样）。在这些内容中，最为著名的，恐怕是对以色列人最初把社会革命视为从一种生产方式过渡到另一生产方式之机制这种思想的再造。

因此，戈特瓦尔德平淡如水的叙事风格在他对社会、政治及经济变革的狂热中找到了自身辩证的对立面；当然，这种狂热是用极为理智的语言表述的。对于形式和内容之间的这种强烈差异，我们应如何看待？稍后我会说明这种矛盾是如何标明其他一些同样明显产生差异的地方，但是在此之前我要首先进一步审视一下其内容。且不说正如《在其自身社会环境及我们的社会形势下的〈希伯来圣经〉》（*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的组织结构所表明的那样，戈特瓦尔德致力于其自身社会形势下的变革，也且不说他所运用的矛盾模式，以及期待这种模式能够产生的矛盾反应，^②我对戈特瓦尔德著作内容的进一步审视要始于文学。

戈特瓦尔德多次声明文学的不同类型意味着不同的社会及

① 在此，最好的例子出自“圣经学会和美国社会具有可比性么？——对下一次美国革命的政治类比”那个章节（参见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307-324）。

②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xx.

文化形势。《耶利米哀歌》兴起于那些被剥夺产业的农民和被剥削阶级,那些人在巴比伦流亡中被抛在后面去面对遭到毁灭的乡下和城镇。^①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申命记》可视为约西亚中坚统治力量下的产物;他们热衷于在耶路撒冷进行激进的社会、宗教尤其是经济上的中央集权统治来收复失地和恢复权力,因此一概反对地方上的宗教行为、宗教人事、社会团体及经济模式。^②

由于不同类型的文学和不同层次的校订(重新)构建出对立的社会形势,因而正是社会阶级更直接地涉及对立和(偶尔是暴力的)冲突。最近,戈特瓦尔德把社会阶级视为古以色列社会的元素和诠释因素进行研究。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离开了冲突和暴力,阶级当然是不可想象的;阶级之间是对立的;阶级斗争是历史前进的基本动力。因此,戈特瓦尔德设立一个关于古以色列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假说,^③且认为在圣经阐释中阶级有着不可或缺的诠释作用。阶级的形成与意识形态是紧密联系的,事实上依赖于后者。这为统治阶级的暴力统治和剥削予以辩护,但也增强了被统治阶级的反抗情绪。^④但是,在戈特瓦尔德的著作中,

① 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的 *Studies in the Book of Lamentations*; 以及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65-173。

② Norman K. Gottwald, "Social Class as an Analytic and Hermeneutical Category in Biblical Studies", *JBL* 112, 3-22。

③ 戈特瓦尔德得出结论:在君主制的以色列,统治阶级由两个部分组成:其一是国家职能部门阶层,依赖国家税收和土地租金生存;其二是庄园主阶层,通过农民的未偿债务占有农民的土地,从而扩大自己的地产,继而让那些农民贷出土地,让他们在被夺走的土地上继续耕作。他也确定了被剥削阶级的两个组成部分:其一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其二是在庄园主土地上耕作的佃农。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30-164。

④ 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48。然而在其他地方并未对意识形态进行深入的理论探讨,比如该书的第 58、69、179、184、220、243-245、368 页。

社会阶级是在与生产方式的联系中进行理论探讨的。^①

在戈特瓦尔德诸多著作中无一例外出现的“生产方式”，是他分析策略的一个要素，不过生产方式也出现在最具战斗性和最具伦理敌对性的场景中。在他知名的也一向精妙的以色列起源论中，他认为经历历史性突变的以色列颠覆了占据主导地位的纳贡（或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在犹太的山野里建立起具有共产主义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以及意识形态等一切特征的共产主义生产方式。这种趋势扩展至整个正典圣经只是时间问题而已：在戈特瓦尔德的多处论述中，^②古代近东以色列的社会经济历史，经历着紧张、冲突和过渡的各个阶段，一直述说着共产社会的、当地纳贡的、外国纳贡的以及奴隶制的各种生产方式。换个角度可以看到，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较之其他方式而言，处于一个更重要的位置。因为在突变的以色列社会中，它占据着主导地位；在时代转变进入基督和犹太传统之时，尽管外部压力增大，它仍然屹立不倒。确实，对戈特瓦尔德而言，耶稣的教义和两次叛乱（公元66-74年以及公元132-135年）之后法利赛人对犹太教的重建皆

① “对于我们目前在古代社会及圣经社会方面的研究而言，马克思主义进行分析的主要观念即为阶级；阶级定义为人们和生产方式之间的关系，即生产之物质力量（包括人类的体力和脑力）和生产之社会关系的结合体，后者意指生产者（以及非生产者，这里就产生了阶级）组织其生产活动和占用劳动产品的方式。阶级产生于一些人的生存依赖于另一些人的劳动产品。这种依赖别人劳动成果的生存方式称为剥削，客观上意味着当一个劳动者的生产价值超出该劳动者的生存需要时，由别人占用了这部分生产价值。这部分超出劳动者生存需要的劳动产品称为剩余产品，或者剩余价值；剥削者对生产的物质进行消费和交换，因此使生产者无法使用或交换体现其劳动的物质。那么同样的，阶级是对生产者与非生产者极力增加、减少或者阻止对劳动剩余产品占有的一种客观描述”。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147-148。

② 参见 Norman K. Gottwald 的 *The Hebrew Bible: A Socio-Literary Introduction*；以及“Sociology of Ancient Israel” in *ABD*, VI, 1992, 79-89；以及 *The Hebrew Bible in Its Social World and in Ours*. 351-357, 366-373。

遵循共产主义的基本理想,而这种理想可追溯至早期的以色列。然而在这些情况下,当各种生产方式在冲突和剧烈转变中互相摩擦时,就出现了最持久而尖锐的矛盾和紧张。事实上,暴力支持了戈特瓦尔德的论点,因为历史中的人们可能为恢复一个广泛具有共产主义基础的社会,在文本中留下诸多的暴力痕迹;这在《约书亚记》——《士师记》以暴力结尾的材料中,以及《新约》耶稣至少针对第一次犹太暴乱所作布道的资料中,皆可看到。因此,看起来要全面理解矛盾,生产方式是最好的依据,同时暴力冲突在戈特瓦尔德有关的理论框架中也是最具意义的着眼点。

然而,“生产方式”的一些名称转变却极具意义,这使人想起之前提及的戈特瓦尔德叙事风格和内容之间的巨大差异,以及他本人圣经批判论中的一些矛盾。首先,他对各种生产方式称呼的更换不只意味理论上的改进,其中最明显的地方是把“亚细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称方式)生产方式变更为“纳贡的”。一个更具特征的例子是:他用“共产主义社会的”来替换“原始公社”,虽然对于他而言,前者并非一个清晰的指称。^①在这两个例子中,确切而更具历史倾向性的指称均被不确切而历史性稍逊的指称所代替。戈特瓦尔德确信共产主义社会生产方式的正义性大于纳贡的方式。或者说,他采用一个不同的术语,欲在共产主义社会的方式中对那种极大的欲望进行控诉。在此,人们一般会认为这会激起各色的伦理反应;这种强烈的伦理差异,如果有的话,就会成为戈特瓦尔德著作中持久存在的奇特特征之一。但是与此同时,这种差异在另外一种转变中,不仅提供了戈特瓦尔德阐释学的基本结构,也对他的著作何以被人们描述为“坚定的学术”给出了一个更令人满意的原因。在阐释的层面,我认为之前

① 事实上,他似乎用新石器时代的农业(基因血亲关系或等级亲族关系)瓦解了狩猎和采集果实(部落社会、原始共产主义或游牧部落)。

提及的术语转换使戈特瓦尔德得以将其他类型的生产方式归之共产主义社会的/纳贡方式的对立方式之下,即民主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但同时却将后者的对立面抛回至前者。正如之前引用的《耶和華部落》献辞,正是顺此轴线,他才得以将圣经社会和当代社会进行比较,才得以在同一轴线上将伦理评价来回推移。等式的一边是赞许,而另一边是毁誉。这是我何以认为历史重构亦极具乌托邦色彩的缘故。虽然他避免使自己的著作被视为乌托邦,而更喜欢人们把自己的作品看作科学编史,然而我们却看到其作品具有极强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伦理特征。这一特点其实近似于民主社会主义——至少对某些人而言,乌托邦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另一代称——继而民主社会主义自身便被视为本质上属于圣经社会。这一切为马克思主义的原始公社概念上演了自身演变的一幕:其作为神话起源的身份在历史的另一端演变为最终的生产方式。

因此,在戈特瓦尔德的著作中就出现了一串相关联的对抗因素:从受压制的叙事风格和激情四起的内容之间的对抗(之前提及的对马克思主义的固守和批判性活动这两者之间的相悖,在此亦体现出来),到纳贡的(亚细亚的)生产方式和共产主义社会(原始公社)生产方式之间的对抗,继而到资本主义和民主社会主义之间的对抗,最后又到科学编史和乌托邦文学之间的对抗。然而,我们亦可把这些分裂和对立看作戈特瓦尔德自身不可思议状况的图示和标志体系。让我们看一下戈特瓦尔德不可思议的状况吧!他是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一位生活在世界上最发达的——因此也是最颓废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亦是一位坚持在基督教教堂内而非教堂外,孜孜不倦地进行工作的一位马克思主义希伯来圣经学者!当然,此时转向实践,其本身便是典型马克思主义者的行为,但是对于我而言,戈特瓦尔德著作中的紧张对抗因素似乎与他自身的状况有本质联系。潘瑞·安德森(Perry Anderson)的专题论著《西方马克思主义之思鉴》

(*Consideration on Western Marxism*)为我们耳熟能详。安德森在其中清楚陈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所面临的诸多困难:缺乏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革命基础的问题、松散分布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缺乏团结的问题、诸多人的个人主义问题,以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强大的资本主义力量下先决性地仅仅关注美学和经济学的问題。换言之,尽管当地取得多次胜利,但是要取得社会的革新是不可能的;许多人由于对行动主义/激进主义的失望而走进学术界、文学界和哲学界。对于戈特瓦尔德以及任何一位在美国从事研究的学者而言,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的支配地位使这一状况变得更糟;虽然在某种意义上——像马克思在当时的资本主义中心伦敦一样——这些学者因此具有观察资本主义运作的最大优势。最后一个对抗因素存在于马克思主义者和基督教学者(指希伯来圣经的基督教学者,其自身即极具对抗性)之间:^①其矛盾在于这种双重身份很难引起任何一个“选区”支持者的注意和认同——一方面,马克思主义者会警惕任何执着于宗教的人;另一方面,基督教堂(对于戈特瓦尔德而言,是浸信会教友)不会乐意接纳一位马克思主义者。

大卫·乔布林

“对任何试图成为男性女权主义者、为穷人鼓吹的富人、美国的社会主义者——越来越自相矛盾的现象——其信仰遭受着威胁。”^②

① 菲利普·戴维斯(Philip Davies)在私人信件中提出这一点。

② David Jobling, “Writing the Wrongs of the Worl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in the Context of Liberation Theologies,” in *Poststructural Criticism and the Bible: Text/ History/ Discourse*, ed. Gary A. Phillips (Semeia, 51;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0), 82.

“‘强迫劳动’……是(马克思主义意味下的)‘历史’强加于我们的——为革命而工作,不可剥夺的劳动”。^①

戈特瓦尔德语句中整齐的韵律为热情但却冲突四起的内容增添了一种学者风范,然而大卫·乔布林的叙事风格起初对内容却大有裨益,因为当他的语句冲破结构主义的束缚时,即呈现出活力四射或爆发性的特质,充满着对新事物的希望。尽管这种抗争毫不遮掩地存在于乔布林著作一些狂欢化的篇章中,然而在此,对于其试图将解构与解放结合起来的做法,我仍然打算予以探索。我的研究,再一次转向由这些学者之境况而衍生出的对抗因素标志——从以上乔布林著作的引文中,我们已可看出这些标志的些微端倪。

在戈特瓦尔德那里,矛盾的典型特征是辩证法,同时矛盾亦标志着诸如政治愿望、道德投入以及历史本质的假想等更广泛的问题。乔布林的著作有些不同,其矛盾无所不在,但在作者的重心从结构主义^②转向后结构主义之时,矛盾产生了变化。在早期阶段,结构主义实践勃发的技术主义、科学性以及结构主义皈依者热情的投入使外来者或者漫游者感到无法亲近。复杂的文本分析以及全新却单调的词汇——二元思维、范式、语段、同位素、作用者等——包括各色带有“-eme”的新词,赋予结构主义一种更

① David Jobling, “‘Forced Labor’: Solomon’s Golden Age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in *Poststructuralism as Exegesis*, eds. David Jobling and Stephen D. Moore (Semeia, 54;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92), 74.

② 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Three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Old Testament* (JSOTSup, 7; Sheffield: JSOT Press); 以及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II.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Hebrew Bible* (JSOTSup, 39; Sheffield: JSOT Press); 以及 “Structuralism, Hermeneutics, and Exegesis: Three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USQR* 34: 135-148.

接近物质科学的陌生领域之感。然而,正如詹姆逊(Jameson)提醒我们的那样,这最终也演变成文学批评的领域,即有关叙事、涵义、话语、思想内涵及表现的领域。^①正是在此我们找到了早期的乔布林,其沉重艰涩的文本^②要求以自身的技术术语来支持作者的这段见习期。^③在此,矛盾、二元对立以及他们之间的调解处于突出位置;或者换言之,他所采用的假说实为这样一个虚构(myth):即以扩展叙事及其他的艺术创造形式,在社会及政治的层面上通过文化上的努力来消解矛盾。这种模式更要归功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④尽管他本人在是否把其方法运用到希伯来圣经的问题上犹豫不决;此外,在很大程度上还要归功于格雷马斯(Greimas),在格雷马斯那里矛盾得以最持久的对待,而且格雷马斯的结构主义释经学尤为独特,其释经学文本一直保持着调查研究下的新奇特征和轮廓,而非沿袭阐释的正统学说。^⑤因而,乔布林创作的早期阶段出现下列研究:《撒母耳记上》13—21

① Fredric R. Jameson, " 'Foreword' to Algirdas Julien Greimas", in *On Meaning: Selected Writings in Semiotic Theory* (trans. and intro. Paul J. Perron; Theory and History of Literature, 38;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7), vi.

② 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Three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Old Testament*; 以及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II.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Hebrew Bible*.

③ Ibid., 101-102.

④ 乔布林把来自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主要观点视为:"二元思维和调解;虚构(myth)为矛盾在经验中的生发;范式代替了语段;代码的概念,其价值体现于初级语义组织;剩余(residue)致使迭代过程出现,即一个阶段的内容成为下一阶段的资料;多个虚构(myths)即彼此之间的转变。"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Lévi-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Hebrew Bible", in *Anthropology and the Study of Religion*, eds. Robert L. Moore and Frank E. (Chicago: Center for the Scientific Study of Religion, 1984), 197; 以及 "Robert Alter's *The Art of Biblical Narrative*", *JSOT* 27, 92-95.

⑤ David Jobling, "Lévi-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Hebrew Bible", 197.

中神授王权的王朝变更、^①《民数记》11-12 中摩西的困难、^②《列王纪上》17-18 中文本与文学语境之间的对抗^③或者文本投放的叙事模式之间的对抗(在此有个例子:《创世记》2-3 中的“创造与堕落”和“男人须耕作”之间的对抗)、^④《士师记》2:11、《撒母耳记上》12 中士师权力抗衡王权的叙事困难,^⑤以及《民数记》32 和《约书亚记》22 中约旦河内外疆界的置换。^⑥

这些研究绝非一般性的复杂,一直束缚于结构主义之“冻结的辩证法”(詹姆逊于 1994 年 11 月 16 日的讨论中使用了该术语),其结果只是暂时性地将矛盾推向受困于文本结构的概念模式。换言之,乔布林的兴趣即在于概念悖论或者矛盾修辞,而这种悖论或矛盾的解决方法却超出其能力。正如詹姆逊的观点,这是格雷马斯等结构主义者分析的最成功之处,他们在文本以及文本阐释中追踪到了意识形态对抗及二律背反的痕迹。^⑦然而,詹姆逊对乔布林早期创作的思想影响只是加剧了这些矛盾;若加之足够的决心,这些矛盾便会扩展至生产方式的领域,因而冲突成

① David Jobling,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Three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Old Testament*, 4-25.

② Ibid., 26-62.

③ Ibid., 63-88.

④ 参见 David Jobling 的“The Myth Semantics of Genesis 2: 4b-3: 24”, in *Kaleidoscopic Structural Readings*, ed. Daniel Patte. (Semeia, 18;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80), 41-49; 以及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II. Structural Analyses in the Hebrew Bible*, 17-43。

⑤ David Jobling,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II.*, 44-87.

⑥ 参见 David Jobling 的“‘The Jordan a Boundary’: A Reading of Numbers 32 and Joshua 22”, in *SBL Seminar Papers, SBL Annual Meeting, November 5-9, 1980, Dallas Texas*, ed. Paul J. Achtemeier. (Chico, CA: Scholars Press, 1980); 以及“Lévi-Strauss and the Structural Analysis of the Hebrew Bible”; 以及 *The Sense of Biblical Narrative. II.*, 88-134。

⑦ Fredric R. Jameson, *The Political Unconscious: Narrative as a Socially Symbolic Act*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1), 83.

为经济的问题。对于詹姆逊,二律背反的事物自身即社会矛盾的产物,但是却无法从纯粹思想之层面来解决这种意识形态的二律背反,因此衍生出一个叙事文本;在这种文本下,解决之道即采用常规的方式。换句话说,社会矛盾(基础或语境)的虚构解决方式(文本)通过二律背反的意识形态摩擦得到了调停。那么接下来,乔布林即从文本领域和潜在的二律背反转向社会与政治的层面,而且正是通过詹姆逊的著作,乔布林追寻到了其结构主义阐释的辩证逻辑。因此,在一篇同早期著作较为一致的论文里,^①乔布林以詹姆逊早先的扩展方法^②集中研究《列王纪上》3-10中所罗门王统治的黄金时期。他首先关注那些章节的文学结构,继而转向经济学、性别及智慧三个语义场的“同位素分析”,最终把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纳贡的生产方式(戈特瓦尔德的术语)之间的冲突作为同位素矛盾的最后一点提出。这一研究同关于《诗篇》72^③的另一篇论文是配套的,乔布林在那篇论文中提供了用以与《列王纪上》3-10进行比较的三篇“资料”。在第一篇资料中,可看到“永久动机”(诗72:1-7)的意识形态模式对抗“王的公义可作为永久动力”(8-17)的迹象;这在之后的第二篇资料被置于经济学和律法两个“代码”的更大矛盾背景下。最后一篇资料将文本矛盾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矛盾联系起来。在另一研究中,相较于阐释的三个阶段,他更关注从“从父居”(指丈夫在婚后移至妻子父系亲戚那里居住)到“从夫居”(指妻子在婚后移至丈夫那里居住)家

① 参见乔布林早期的解构主义著作:David Jobling, "Structuralism, Hermeneutics, and Exegesis: Three Recent Contributions to the Debate".

② David Jobling, "'Forced Labor': Solomon's Golden Age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74.

③ David Jobling,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alysis of Biblical Texts: A Jamesonian Reading of Psalm 72", in *Ideological Criticism of Biblical Texts*, eds. David Jobling and Tina Pippin (*Semeia*, 59;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95-127.

庭生产方式的转变。^①从这些圣经文本资料中得出一个最重要的结论,即“生产方式”为圣经阐释的最根本方面;^②正如戈特瓦尔德在探讨中所指出的那样,这也是政治冲突和矛盾的基础。^③

像戈特瓦尔德一样,“生产方式”是乔布林最基本的理解方式。但是,在乔布林的著作中寻求抗争与矛盾之时,我转向了《罄书世界之不公平》(*Writing the Wrongs of the World*)——圣经研究中意义最为重大的论文之一。^④它致力于社会经济的转变,即之前我们所熟知的辩证方法,且在女权主义、解构主义及自由斗争

① 《路得记》;参见 David Jobling, “What, If Anything, is 1 Samuel?”, *SJOT* 7 (1993), 28-29; 以及 “Hannah’s Desire”, Canadian Society of Biblical Studies Presidential Address, 1994。

② 此外,根据弗洛伊德关于压抑和转移的观念,生产方式可被视为历史中的缺失原因(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Sociological and Literary Approaches to the Bible: How Shall the Twain Meet?” *JSOT* 38, 92; 以及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alysis of Biblical Texts: A Jamesonian Reading of Psalm 72”, 3), 因为事实上人们不可能把形成生存基本构架的事物概念化。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Feminis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in Ancient Israel: Search for a Method”, in *The Bible and the Politics of Exegesis: Essay in Honor of Norman K. Gottwald on His Sixty-Fifth Birthday David Jobling*, eds. Peggy L. Day and Gerald T. Sheppard (Cleveland, OH: Pilgrim), 239-251; 以及 “‘Forced Labor’: Solomon’s Golden Age and the Question of Literary Representation”, 72-74; 以及 “Deconstruction and the Political Analysis of Biblical Texts: A Jamesonian Reading of Psalm 72”, 16-19。

③ 在另一处(Boer Roland, *Jameson and Jeroboam*, 118-119)我指出乔布林提供的文本资料也可延伸出这样的观点:这些文本不仅对于意识形态的矛盾尝试进行叙事和诗学上的解决,也徒劳无益地试图从生产方式的层面去解决冲突的问题。《诗篇》72和《列王纪上》1-10正是这样,通过把合法化的王权作为维持和平、公义和繁荣的手段这种并不完美的方式,来拼命地压制政治与经济的暴力对抗。

④ 参见 David Jobling 的 “Writing the Wrongs of the World: The Deconstruction of the Biblical Text in the Context of Liberation Theologies”; 以及 “Right-Brained Story of Left-Handed Man: An Antiphon to Yairah Amit”, in *Signs and Wonders: Biblical Texts in Literary Focus*, ed. J. Cheryl Exum (Semeia Studies; Atlanta, GA: Scholars Press, 1989), 129-130。

(女权主义也归入其中)上以系统的努力来实践圣经的阐释。然而,该论文最有趣的一点即乔布林涉及的理论家。他与欧洲的唯物主义释经学家进行互动交流,也与左翼的圣经阐释家(主要是戈特瓦尔德)论战。他应当十分感谢女权主义的著作,这可由最近的下列许多研究中看出:关于希伯来圣经的女权主义和生产方式、^①对米克·巴尔(Mieke Bal)著作的反思、最近有关《撒母耳记》的研究、^②《路得记》在正典圣经中的地位、^③以及圣经典籍的界限和汉纳(Hannah)的作用。确实,女权主义为乔布林的马克思主义所要求的政治激进提供了资源,这种政治激进的目的是要恢复解构主义在跨越大西洋之前的政治优势。当然这已超出圣经研究的范畴:乔布林希望糅合女权主义和解构主义,将之纳入自己的体系中。然而在整个操作过程中,乔布林的著作存在着一个根本矛盾:著作的理论渊源植于欧洲和北美洲,而他的政治取向却显然超出这个北半球的视野。换言之,乔布林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实践立足于那些常被称为第二和第三世界的地区而非他自己所在的第一世界地区——尽管马克思主义在美国和英格兰有较长时期的历史,以及共产党在法国扮演着重要角色。

然而,乔布林持久的兴趣在于圣经批评及圣经批评家的物理位置和社会位置(这使他这篇论文的自传性质也浮出了水面)。从诸多层面我们皆可看到这样的问题,其中意识形态和经济层面的问题可能是最重要的。乔布林意识到,他处于北美洲机构和地理位置上的边缘地带(圣安德鲁大学位于加拿大的西南部城市萨斯卡通),但是在文中他却透露文学创作和批评发生在“争辩中的

① David Jobling, "Feminism and 'Mode of Production' in Ancient Israel: Search for a Method".

② David Jobling, "Mike Bal on Biblical Narrative", 17: 1-10.

③ David Jobling, "Ruth Finds a Home: Canon, Politics, Method", in *The New Literary Criticism and the Hebrew Bible*, eds. David J.A. Clines and J. Cheryl Exum (JSOTSup, 143; Sheffield: JSOT Press), 125-139.

意识形态区域”。^①与戈特瓦尔德的叙事风格不经意间流露出的学术模式(超然而“客观”的话语)相反,乔布林指出,所有的(圣经)学术在内在本质上皆好斗,因此相关的辩论意味着彼此之间的较量。这不仅指有关以色列之起源以及犹太第二圣殿之本质等严格意义上的学术辩论,更重要的,是指向学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和政治立场。这一争辩的赌注风险越来越大,因为这些赌注往往暗中涉及自由资本主义社会的价值观和生存性,以及人们对之争辩不一的女权主义、土著人群、男女同性恋的激进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除了这些意识形态的问题,人们发现乔布林关涉批评家状况的经济问题被冠之以“全球化的经济”。^②在此我要指出,所有的圣经批评家从事研究的场所——全球化经济即资本主义的,尤其指“晚期”资本主义——当前这个由跨国企业和计算机科技所主导的时代。这一点对圣经学者思考、写作和教授的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有待考证,但是毕竟乔布林已开始视之为一个有待解决的重要命题。

然而,恰恰是在全球化问题上再一次出现了我之前提及的歧义问题,不过此次是有关体制而非经济。乔布林最持久关注的莫过于由一场全球化探讨^③引发的第三世界学术问题,有趣的是,他是从一个体制角度,即高等教育体制的角度,来关注第三和第一世界之间的交互作用。乔布林设置了一个关键的链接,这个链接使他能够在第一和第三世界中间建立理论联系,然而在他的书面资料中却并未出现这一过渡。剥削与压迫构成全球“晚期”资本主义“标准”经济关系的要素,而要想确立一种有体系的剥削和压迫,其关键恰恰在于第一和第三世界的交互关系(美国对拉丁美

① David Jobling, "What, If Anything, is 1 Samuel?" 31.

② David Jobling, "Globalization in Biblical Studies/Biblical Studies in Globalizati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 97-101.

③ Ibid.

洲频繁的军事干预、海湾战争,以及在前南斯拉夫的弃权等)。然而,这些相对缺乏的探讨却返回至我之前所注意到的乔布林著作里的那种压抑和转移。尽管乔布林公开承认自己致力于解放形式的话语,尤其是解放神学,但是在他对最初的解放运动以及解放神学语境的研究中,却出现一个巨大的空白。他总是不断地转向第一世界的文本和理论家。

于是,像戈特瓦尔德一样,乔布林的文本工作总是坚守一点:生产方式的社会经济层面总是出现在圣经的文本分析以及对当代圣经学术的评价中。尽管事实如此,但是在当代圣经学术领域,人们更多地将研究转向第一世界的批评家,而非具有战斗实践和解放基础的第三世界。事实上,戈特瓦尔德亦是如此,尽管他一直对第三世界的材料深感兴趣,但是最终却担心第三世界的批判与社会科学缺乏深度^①(尽管他强调第三世界的学者们一直在努力减轻他这种担忧)。

结 语

我一直关注两位批评家创作存在的歧义和自身对抗,其政治和意识形态理想将其带离第一世界,然而其学术研究却恰未脱离第一世界的范围。悖论出现在各个层面,譬如在戈特瓦尔德的著作中,平淡如水的叙事风格与充满激情的内容之间、纳贡的生产方式与共产社会的生产方式之间、资本主义与民主社会主义之间,以及科学编史与乌托邦文学之间的各个悖论;以及在乔布林的著作中,各种悖论以其越来越辩证的分析方式,出现在向第一世界理论家寻求政治激进主义渊源的过程中。这种悖论对戈特

^① 参见 David Jobling, "Globalization in Biblical Studies/Biblical Studies in Globalization", *Biblical Interpretation* 1: 267-281。当然,鉴于在此对戈特瓦尔德和乔布林的关注,我也追随了这种转向第一世界批评家的风气。

瓦尔德而言也成为一个问题,它衍生出一个更大的矛盾。戈特瓦尔德和乔布林,作为严格意义上的第一世界批评家,其方法论的严密性打开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各种生产方式之间的阶级冲突和对抗成为圣经阐释的关键因素。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是第一世界的马克思主义圣经学者、由于在这种语境下从事研究产生的盲点,使其得以创作出如此敏锐的批判著作。这是一个更大程度上的悖论。

本论文与其说是对戈特瓦尔德和乔布林创作的直接评论,不如说是从同样的马克思主义辩证立场出发与之怀有同感的一篇评说。确实,我认为只有从此视角出发,两位批评家的卓越贡献才能尽可能在最大限度上作为未来研究工作的基础得以利用。希望读者们不要把我所发现的矛盾和对抗特征,仅仅视为我所选用的理解方法的产物;因为同时,它们也构成了戈特瓦尔德、乔布林以及其他采用相似方式的学者们之有价值研究成果的必要特征。当然,这是我在本论文序言中便提出的第一世界之马克思主义的不可思议之处。尽管这一视角困难重重,但是马克思主义仍是在文本、意识形态、阶级、社会、政治和经济之间建立联系的少数话语之一——尤其是当这些联系自身处于被严密监察和攻击之时。

(薛春美 译)

(责任编辑 厉盼盼)

作者罗兰·博尔(Roland Boer),加拿大马克吉尔(McGill)大学博士,现为澳大利亚纽卡塞(Newcastle)大学教授。主要学术研究兴趣为圣经批判理论、圣经与政治、文学与神学、马克思主义与批判理论。著作有《天堂与居家的契约批判理论》(*Contract Criticism of Heaven and Hearth*, 2009)、《前往南极的最后一站:圣

经与澳大利亚的后殖民主义》(*Last Stop Before Antarctica: The Bible and Postcolonialism in Australia*, 2008)、《拯救圣经》(*Rescuing the Bible*, 2007)、《马克思主义者的圣经批判》(*Marxist Criticism of the Bible*, 2003)、《敲响天堂的大门:圣经与大众文化》(*Knock on Heaven's Door: The Bible and Popular Culture*, 1999)等。译者薛春美,郑州大学西亚斯国际学院外语学院翻译系讲师,研究比较文学、翻译理论与实践,近期发表译作《如何理解扫罗王的覆灭》(《圣经文学研究》第二辑),参编《圣经关键词研究》等。